

## 警惕夸大「特殊阶段论」

当前社会有一种现象，总将出现的问题归结于特殊阶段，诸如食品安全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，环境污染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，贪污腐败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，社会分化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，等等。似乎只要还处于这个阶段，出现问题就不可避免，有了问题就可以免责。而只要过了这阶段，问题就可以自然而然解决了。对这种“特殊阶段论”，要予以警觉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每一个阶段都是特殊的阶段。每个时期都有独特的问题。

当下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。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；从封闭转向开放，并面向全球化。中国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复杂的转型，这么迅速的转变，的确史无前例，出现问题的概率自然比较大。

然而，阶段特殊性有一定的限度，不能无限夸大，更不能因此礼崩乐坏。社会发展有一定的通则，最基本的要求既不能随地域变化而改变，也不能随时段的变化而改变。比如食品安全的标准之类，是依照健康的基本要求而确定的。不能说一个时期需要注重健康，另一个时期就可以随意损害健康了。是否损害健康是底线，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没有例外。

客观上存在的特殊阶段是一回事，主观上如何对待这个阶段又是另一回事。一种消极的态度是，对特殊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放任自流，不闻不问，于是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出现了，把坏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。一种更为负面的态度是，借口特殊阶段，以此规避社会约束，钻发展的空子，牟取不当利益，使得不该出现的问题都出现了。而一旦出现问题受到社会非议和批评时，特殊阶段成了一张推卸社会责任的挡箭牌，成了一块掩盖社会良知的遮羞布。

由此看来，对特殊阶段持积极的态度非常紧要。越是处在特殊时段，越是要提高警觉以克服麻痹心理，越是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以防微杜渐，尽力将问题减到最少，将影响降到最低。疾风知劲草。特殊阶段难道不是考验、拷问人们的社会良知的特殊时刻么？

(摘自《东方早报》11.7 陶文昭/文)

最近看到了三个故事。

第一个讲的是“二战”

## 规则的力量

期间，美国空军降落伞的合格率为99.9%，这意味着从概率上来说，每一千个跳伞的士兵中会有一个因为降落伞不合格而丧命。军方要求厂家必须让合格率达到100%才行。厂家负责人说他们竭尽全力了，99.9%已是极限，除非出现奇迹。军方就改变了检查制度，每次交货前从降落伞中随机挑出几个，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。从此，奇迹出现了，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百。

第二个故事，讲的是英国将澳洲变成殖民地之后，因为那儿地广人稀，尚未开发，英政府就鼓励国民移民到澳洲，可是当时澳洲非常落后，没有人愿意去。英国政府就想出一个办法，把罪犯送到澳洲去。

英国政府雇用私人船只运送犯人，按照装船的人数付费，多运多赚钱。很快政府发现这样做有很大弊端，就是罪犯的死亡率非常高，平均超过了10%，最严重的一艘船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37%。政府官员绞尽脑汁想降低罪犯运输过程中的死亡率，包括派官员上船监督，限制装船数量等等，却都实施

款方式变换了一下：由根据上船的人数付费改为根据下船的人数付费。船东只有将人活着送达澳洲，才能赚到运送费用。新政策一出炉，罪犯死亡率立竿见影地降到了1%左右。后来船东为了提高生存率，还在船上配备了医生。

第三个故事，讲的是某日本高级酒店，检测客房抽水马桶是否清洁的标准是：由清洁工自己从马桶中舀一杯水喝一口。可以想象，这样的马桶会干净到什么程度。

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人的坏念头受到抑制，而坏的制度会让人的坏愿望四处碰壁。中国农村原来实行人民公社制度，生产率极低，后来实行包产到户，生产率彻底改观。

当结果与个人责任和利益联系到一起的时候，很多社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，比如，食品安全问题……(摘自《芳草·经典阅读》2012年10月上旬刊蔡真妮/文)

## 企业家的自我救赎

在接受《财经》杂志的专访时，联想集团掌门人柳传志先生坦率承认，他所代表的整个企业家阶层，“是很软弱的阶层。”软弱表现为如下两点，其一是不敢抗争：“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，企业家没有勇气、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，只能尽量少受损失。”其二是缺乏公共关怀：“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，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，没有‘以天下为己任’的精神。”

当下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的精神气质，与学者金雁在她的新著《倒转“红轮”：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》中，所着重解剖的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非常接近。

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，是一个正在觉醒的阶层，是一个开始具有人道与悲悯情怀的阶层。但是，他们所有这些努力，并没有能够消弭底层民众对他们的深刻怀疑乃至仇恨。最致命的因素，在于贵族自身的人性弱点，即他们的二元人格。他们的大脑往往是清醒的，但是他们的屁股则坐在既得利益这一边，坐在特权这一边。这就导致了他们思与行、言与

行的分裂。他们思想上反对沙皇，现实中却受沙皇的恩宠，因为沙皇的恩宠不劳而获、养尊处优。他们明知这不道德，所以他们不断地自责，不断地忏悔。但在行动上，他们却不能果断拒绝恩宠，不能拒绝自己的既得利益。

(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11.12 王玉香/文)

## “劫富济贫”须走法治化路径

分配制度的法治化改革，关键是要对垄断行业收入进行法律规制。控制垄断行业和资源行业的暴利，矫正企业高管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畸高，是公认的分配制度改革难点和重点，而打破垄断集团利益，引入充分的市场竞争，最有力的手段是法治。另外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涉及的一些领域，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、工资制度改革等，需要进入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。如此才能赋予收入分配改革充分的合法性和权威性。

(摘自《法制日报》11.8 许平/文)

从古而今，人们都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和行为——“嫉恨”，它具有嫉妒、羡慕、崇拜、痛恨等极具复杂的意义。似乎是人们对于社会不公而形成的感受。因此，嫉恨这种心理及行为，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对社会公平的渴望，命好的人生

学、制度学的进步，人们了解到，嫉恨既是人性，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性。

它通常是人们对于社会不公而形成的感受。因此，嫉恨这种心理及行为，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对社会公平的渴望，命好的人生

## 嫉恨可以催生正面力量



因此嫉恨和痛恨并不完全是负面的，它是制度公平的起源。嫉恨这种情绪和行为经过新的解释，已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催生出制度与社会改革的正面力量。

当代美国政治学家艾尔斯特朗指出，如果一个社会公平，有良好的秩序及教育投资，那么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就会增加，命不好的人通过努力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他的命不好，他嫉妒别人的命好，因此，更加努力去创造自己的人生。嫉妒可以创造努力的动机，当嫉妒有这样的正面作用，这时候一个人被别人嫉妒还变成是件好事，被别人嫉妒也不会有被嫉妒的恐惧。

因此，一个社会一定要重视人民嫉恨的情绪与行为。当人民出现嫉恨的声音，这时候整个社会就要去自我反省：社会是否公平？是否有有人有特权？社会是否存在差别待遇和歧视？(摘自《南风窗》2012年第23期南方朔/文)

但到了现代，由于心理学和哲

## 新锐短评

不下去。

最后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劳永逸的办法，就是将付

## 改革本身的公平性

改革必须突破樊篱，但这种突破不可能采取暴风骤雨式的办法，而是要善于利益博弈。这种博弈不能仅靠“杀出一条血路”的勇气，还要靠“求取最大公约数”的智慧。面对利益博弈，还需要一个基本的价值观，这就是公平。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，但改革本身即有一个公平性问题。只有不受各利益主体的左右，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，改革才能赢得人心。

(摘自《京华时报》11.11 吴乔/文)

## “屌丝”成流行语的背后

“屌丝”，原为粗语，现今已成为青年群体中的流行语和文化现象。这是社会原因在青年群体中的直接映现与投射。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使贫富差距加大，“屌丝”式的自嘲，就源于财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，以及流行的择偶审美标准。许多青年面对的现实是：即使竭尽全力去奋斗，自己财富的积累与“高富帅”、“白富美”所拥有的基础与条件还是相差很远。所以，不难理解“屌丝”那种复杂心情的表达，既有对现实的不满，也有无力改变现实的无奈；既有对“高富帅”与“白富美”的羡慕嫉妒，也有对他们

的不屑。

(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11.12 王玉香/文)

## “劫富济贫”须走法治化路径

分配制度的法治化改革，关键是要对垄断行业收入进行法律规制。控制垄断行业和资源行业的暴利，矫正企业高管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畸高，是公认的分配制度改革难点和重点，而打破垄断集团利益，引入充分的市场竞争，最有力的手段是法治。另外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涉及的一些领域，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、工资制度改革等，需要进入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。如此才能赋予收入分配改革充分的合法性和权威性。

(摘自《法制日报》11.8 许平/文)

## 艰辛的“对调”团圆之路

对调工作，大概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兴起的，它涉及到户口、单位编制，手续繁瑣复杂，但这是那个年代普通人要解决夫妻两地分居、远离家乡等问题的唯一办法。他们在城市某个特定的地方，电线杆、行道树上贴上自己的对调启事，留下联系地址，等有人来联系。只要双方单位性质(全民、集体)一样，就可以写对调报告，经审批后，就可以办理商调手续。当然，审批也是很麻烦的，还要审查对方的家庭出身、政治面貌等等。这过程很漫长，有的要等一两年，甚至更长时间……

## 闷棍：人口不对等

在北大荒整整奋斗了11个年头，1978年11月我随知青的返城浪潮，也回了北京。因为我爱人高金凤是上海知青，不能直接办到北京。1979年3月，她在北京生下了我们的儿子，才过两个月她就抱着孩子，匆匆回上海落户去了。从此，我们开始了长达6年的两地分居生活。我俩不止一次地互相鼓励，一定要冲破千难万阻，为早日团聚而努力！

那些日子，我托付所有的亲戚、朋友、同学、战友帮我关注所有这方面的信息。北京的电线杆被我抚摸了不少，因为那时对调的小广告都贴在上面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1980年底时，我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对调人——北京第六制药厂的女员工吕秀芬。她的丈夫董沪琪在上海，他俩也是兵团战友，也一直在努力奔走，苦寻对调目标。我们见面后，聊得非常开心，很快达成了协议，并以最快的速度各自从北京、上海，同时向主管部门递交了对调申请。

吕秀芬工作的第六制药厂属于西城区劳动局管辖，对调手续要在那儿办理。于是我有空就往西城区劳动局跑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得到了确切消息，商调函已到，双方情况属实。但还是不能办，因为我儿子的户口要随他母亲，是两口人进北京，而吕秀芬的确没有小孩，是一口人人沪，双方条件存在差异，不能对调。

听到这个结果，我感觉真像当头挨了一棒。我懵懵懂

懂地跑到小吕家，嗔怪她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要个孩子呢？她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：因为患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，所以他们从没打算要孩子。

第二天，我请假来到市劳动局信访办，把我们的情况详细做了叙述。当时接待我的干部还是个老同志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想要对调工作，人员户口一定要对等，不能上海少了个户口，北京多了个户口。那样绝对不行！”你们双方要对调，就让北京的这个同志生个孩子再对调，否则就重新再找个有孩子的人对调。”

## 对策：心脏病人冒险怀孕

晚上，我急忙给上海的董沪琪打长途电话，他听后说让他认真考虑考虑。三天后，小董郑重地对我说：“为了战友，为了朋友，为了我们两个家庭，今天我俩君子协议，我豁出去了，决定要个孩子！”

1982年夏天，小吕成功怀孕。我掐着指头过日子，两个月，3个月——6个月——9个月，在这当中，我经常买些好吃的东西送到小吕家并寒暄问暖。因她身体欠佳，很担心，恐怕出现任何意外。说句实话，我爱人怀孕时，我都没有这么尽心尽责，现在想想真有些愧疚。

## 冷水：单位性质不一样

孩子出生，母女平安。几天后的一个早晨，我和董沪琪天不亮就来到西城区劳动局，8点整，我们第一个冲进接待室，递上“关键”材料，“出生证、户口本。”期待的目光紧盯着工作人员，他拿出我们其他材料，仔细看了看，然后皱了皱眉头，开腔了：“上海要来北京的这个人是大集体企业，北京要去上海的这个人是全民企业，全民、集体不能对调！”一盆冷水，不！是一缸冰冷冰冷的水从天而降，浇得我俩目瞪口呆。

随后几天都是在恍恍惚惚之中度过的。我考虑再三，下定决心，决不放弃，一定要继续努力。

## 解决：战友哥哥帮忙

一天傍晚，小董突然来到我家，说他一个兵团战友的哥哥是某某大企业管劳资的领导，同西城区劳动局的关

系密切，已拜托他去劳动局打探清楚，我们这种情况是可以对调的，只不过要在自己找到接收单位，只要接收单位同意接收并告知劳动局，劳动局就可以直接给上海发商调函。

我立马抓紧联系，碰巧我家附近的地区幼儿园缺少教师，而且是个大集体企业。我急忙来到街道办事处，主管领导是我街坊，看完我爱人的简历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二话没说，同意接收，并答应尽快给西城区劳动局发函。

难忘的一天终于来到，那个战友的哥哥约会小董和我，早晨10点在西城区劳动局见面。我俩提前赶到那里，没多久战友的哥哥到了，手里提了个大号书包，从看门的老大爷、打扫卫生的阿姨、再到各个科室，没有一个人不同他打招呼，而且都非常客气。战友的哥哥是逢人便送两本杂志，后来我知道，那本杂志是那个年代人们最热衷的，而且是非常紧俏的。转了一圈后，战友的哥哥带我俩来到办公室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客气的问候他，并且询问是否有事要办。战友的哥哥直截了当，指着董沪琪说：“这是我表弟，在北京的爱人要对调去上海，材料已经准备好了，时间长了，现在上海来北京的人员自己找好接收单位，并已得知通知，就差你们发调令了。”有个看似领导的人边说边站了起来，嗨，这点小事还劳你亲自跑一趟，打个电话不就行啦，小王，快把材料找出来。”小王很快就把所有的材料拿了出来，那个领导大概看了一下，吩咐小王：“开商调函。”开好之后，那位领导拿过来直接交给了战友哥哥，并说：“并不是自己带回去保险，要比我们寄快。”

苦难煎熬终于结束，让我们夫妻团聚，结束了长达6年的两地分居生活。小董、小吕夫妻俩更是由此契机拥有了自己的孩子。虽然尝尽了特殊年代的酸甜苦辣，但我始终认为，命运对我们的安排还是不错的。好事多磨，知足者常乐吧！

(摘自《周末》7.19 苟瑞民/文)

那年

## 那一年，莫言卖书没要钱

记得那一年，我见到莫言时，是他最尴尬的时刻。那是1986年6月29日，我在北京，那天莫言在王府井书店卖书，跟他一起卖书的还有王蒙、张贤亮、刘索拉等人。那也许是现代中国作家首次签名售书吧，我没有考证。反正那天人不多，王蒙、张贤亮和刘索拉的台前有排队的人，莫言的台前没人，这种鲜明的对照，令莫言很尴尬，他一个刚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年轻人，卖自己的书，如何卖得过王蒙和张贤亮？虽然刘索拉也是年轻人，但好歹是个美女，总有读者青睐的。唯莫言此刻寂寞无比，站起身来在大厅里溜达过来溜达过去，看上去很失落。

我那时算是阅读面比较广的人，也读过莫言，彼此看上去都是年轻人，顺眼，于是跟他闲聊起来。聊他的作品，他很兴奋，那双小眼睛里流露出得意的笑容，很感激的样子看着我。于是我决定买他的书，让他签名，心里想一定要给这个年轻人信心。他拉着我的手，到他的台前，拿出一本，刷刷地签了名，递给我，说：“这本书送你了！”

这可为难了，人家来卖书的，怎么可以送？他说：“对你，不卖，送你了。”

我看了看手里的书，书名是《透明的红萝卜》，定价2.20元，印数6000册，于是收下了。然后，当然是说了一堆好听的，再然后就互留了电话，那是1986年我们都还没有手机，留的都是单位的电话。

(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熊昌烈/文)

## 中俄外长“斗嘴”黑瞎子岛

2008年12月17日，李肇星应邀到河北工程大学演讲时，披露了一些外交事件的花絮。

2005年，中俄签署“互换《关于中俄界河段补充协定》的批准书”时，俄罗斯外长向时任中国外长的李肇星征求《协定》的具体签署日期。李肇星说：“当时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最喜欢过‘六一’儿童节，对少先队的美好时光印象深刻。所以，我表示最好6月1日签字，这也符合双方领导的共识。后因对方送文件的飞机晚点等原因，工作失误，致使6月2日才签。但毕竟我们将祖国的部分领土重新划入了国家版图！”

该协定的签署，最终解决了中俄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划分问题，其中收回的领土中，就包括备受国民关注的黑瞎子岛。李肇星说：“1929

胡晓勤/文)

那语